

【史海钩沉】

明代中后期士商关系再探讨

——以内阁首辅张四维为中心的研究

余劲东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文化学系 中国 香港 999077)

摘要: 明代士商关系学界关注已久,普遍认为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士商间的广泛交流。而通过对明代内阁首辅张四维这一成功士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成长于商人家庭并处于商人关系网中的官员,虽因商人支持获利良多,但由于长期受儒家教育,反而会显示出“敬商远商”的情形。所谓士商交流密切,更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商人儒者化完成的,并非士人放下身段对商人的主动迎合。

关键词: 明代;士商关系;张四维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910(2015)02-0014-05

明代因经济发展产生了数量巨大的商人阶层,而传统的科举入仕观念仍根深蒂固,通过读书取得功名同样成为不少士人的优先选择。在此背景之下,士人与商人之间产生了比较广泛的互动。明代士商关系问题一直为过往研究者所关注。诚如庄兴亮所言,中国古代家族一直延续“农商并举到富而重教”^[1]之老路。但受益于“富而重教”并得以成功的士人如何回头看待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商人?有学者认为“十六世纪以来长期的士商互动使儒家的社会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向。”^{[2]56}“士与商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分不清。”^{[2]50}这种结论是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本文将以后16世纪后期担任阁臣长达8年并一度担任内阁首辅的张四维(公元1526—1585年)为中心加以分析。

张四维,字子维,号凤磐,山西蒲州(今运城市)人,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进士,官至内阁首辅。与出身于平民阶层的进士不同,张四维自出生时就坐拥强大的政治资源:吏部尚书杨博(公元?—1574年)为其同乡,宣大总督王崇古(公元1515—1588年)为其舅^{[3]5769},万历初年入阁的马自强(公元1513—1578年)与其为儿女姻亲^{[4]692}。之所以选择张四维作为研究对象,乃因其作为一个身处官员网络中的重要人物,却为不少商人写过墓志铭。墓志铭作为具有“盖棺定论”

性质的传记文体,亡者家属会格外慎重地择人撰写,而撰写人同样会谨慎对待墓志铭的书写。张四维所作墓志铭计54篇,其中专为商人所作即达15篇,比例高达27%,其余皆是为其同僚所作。出自其手的商人墓志铭,不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在明代阁臣中无人可匹^{[5]73-86};即使高官中也少有人能出其右。这种现象十分罕见。此外,张四维周围的山西商人也是明代商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兼具商人后代和高级官僚双重身份的张四维为中心探讨士商关系,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一、商人网络中的士人张四维

从张四维为商人所写的众多墓志铭来看,不难发现其处在一张巨大的商人关系网中。日本学者小野和子曾对其直系亲属中的商人状况有所考订^[6]。笔者试就所见材料对小野的研究加以补充。

张四维出生前,父母就为其构筑了“先天”商人关系网:其父张允龄为成功商人^{[4]767},叔父张遐龄短暂商业失意后也迎头赶上^{[4]743};其母王氏之姊嫁给沈江^{[4]736},沈家父子都以商为业^{[4]734}。

张四维通过自己、兄弟的联姻以及交游,也构筑了更为坚固的“后天”商人关系网:他娶妻王氏,

收稿日期: 2014-11-19

作者简介: 余劲东(1987—),男,湖北武汉人,回族,博士生,主要从事明代政治史、制度史研究。

妻父王恩与妻兄王海都是巨商；诸弟也为张四维商人网络的构建贡献颇多：二弟娶商人李季之女^{[4]738}；五弟先娶商人王寅之女^{[4]688}，后娶商人范世逵之女^{[4]739}。

此外，张四维利用学友关系与不少商人建立了紧密联系，这层关系则鲜为前人所关注。如商人韩玻之子韩楫（公元1528—1605年）为朝夕相处的密友。张自称“余为弟子员，则为（韩）楫友……余辈二三同志共学南亭，离经考业，朝夕亶亶。”^{[4]737}与其走得更近的是同乡商人徐氏家族的传人徐经。徐经是商人徐昂之子，与张四维年少时便是密友。张曾说，“自余为诸生，与公子（徐）经游”其关系的亲密竟至于“公（徐昂）宅东有精舍，维岁居其中者半焉，不知其非家也”^{[4]741}；徐经的叔祖父徐杲也是巨商^{[4]742}。总的来看，张四维周围至少有8个蒲州巨商家族，包括其父张氏、其母王氏、其妻王氏；其弟媳李、王、范氏；其友韩氏、徐氏。每个商人家族与张四维都具有地缘、血缘或姻缘联系，自然不会吝惜利用资财为张四维仕途上的进取提供助力。

二、士人张四维与商人的交谊

且不论舅舅尚书王崇古、同乡先达尚书杨博在政治上对张四维的提携，仅从商人角度来看，张四维便已获得几乎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虽然这种经济支持并不足以构成其仕途通达的决定性因素，但无疑为其提供了不少便利。

早在张四维读书以图仕进之时，周围商人们便在“富而重教”传统观念影响下，为他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其父在外经商时，“每贻书督励，购诸经、传、注、疏、义及《史》、《汉》诸书，车寄之”^{[4]769}。在购书成本比较昂贵的古代，这种以车寄书的条件绝非一般学子所能得到。韩母对韩楫的教育投入几乎达到不计成本的地步，为其延请的老师是“善教，出其门者率有显效”的李公，“其供馈之需，器用之备，岁且再易，未有厌焉”^{[4]737}，张四维与其朝夕相处，旁沾自然不少。其读书场所时而在韩氏之南亭，时而在徐经之精舍，亦是条件优越的处所。充足的书籍、有名的教师、良好的读书环境加上本人的努力，张四维在而立之年便中进士。

入仕之后，充足的经济保障同样为张四维仕进提供助力。其仕途发迹从穆宗即位时开始：短

期担任经筵讲官后，便在短短四年间历任左谕德（从五品）、翰林学士（正五品），进而直升吏部右侍郎（正三品）。如此快速的迁转极为罕见。究其原因，乃张四维在隆庆时与内阁首辅高拱关系良好而得到多次举荐。给事中曹大埜在弹劾首辅高拱时牵连到张四维“吏部侍郎张四维（高拱）以八百金，即取为东宫侍班官。”^[7]以此观之，高拱在短短数年内对张四维几次提拔，除了对青年官员的赏识外或许还有利益往来。接替高拱的张居正（公元1525—1582年）死后被抄家时“得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3]5651}，有多少来自张四维的进献虽不得而知，但“四维家素封，岁时馈问居正不绝”^{[3]5770}则是不争的事实。张居正也并未亏待张四维，不仅在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援引张四维入内阁，更在万历六年回籍安葬亡父时令其暂管政事，并援引其姻亲马自强入阁，甚至连亡父墓志铭都请他代为书写。二人关系可见一斑。

除与两任首辅保持良好关系外，张四维和当时最重要的宦官、外戚也都交谊匪浅。万历初年最重要的宦官当推司礼监太监冯保。万历三年张四维入阁时冯保便与其交好。张居正死后，张四维与冯保的关系曾因故一度进入冰点，但张“求（冯）保心腹徐爵、张大受贿保”，冯因之“意稍解”，金钱缓和了二者矛盾。当时最重要的外戚万历帝生母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也是张四维在朝内的重要奥援^{[3]5771}。李伟其人非常贪财，《实录》中有多条其向皇帝索要金修房屋、坟墓之事，在办置军装时李伟中饱私囊甚至引起了军士哗变^[8]。而张四维却能引之为奥援，其中的打点想必所费不貲。

不难看出，张四维利用身后商人所提供的雄厚财力资源，与当时朝中最重要的都构建了良好交谊，这对他仕途上进帮助极大。张四维所生长的蒲州地区士人中举和入仕的情况并不理想，时称“山右列郡，称文学科第，以蒲（州）为首，然往往不出郡廛十余里中；诸乡社去城远者至百余里，士成名者盖鲜，即名成，宦亦鲜达”^{[4]719}。张家居蒲州通化坊，离“郡廛”有数十里之遥，按当地传统属于“成名者盖鲜，即名成，宦亦鲜达”之区域。但张四维一反蒲州成例，不仅成名且宦达首辅，看来身后商人对他的种种投入并未白费。

在张四维走向权力之巅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忘记对其背后商人的回馈。据明代考满、封赠的

成例,父、母、妻与张四维本就是一荣俱荣。成功后的张四维对弟弟同样帮扶有加,虽然目前尚未见资料证明张利用自身权力帮助胞弟取得商业上的更大成功,但为从商的弟弟取得了商人颇为向往的“功名”则是事实。张母王氏“凡生七男子,系自乳。……二人早殇,五人者皆壮,有室家”^{[4]746}。除四弟张四事年轻去世外,其余三位弟弟皆以商为业。张四维援引工部入赘之例,使二弟张四端成为后军都督府都事(从七品)^{[4]768},三弟张四教成为龙虎卫指挥金事(正四品)^{[4]744},五弟张四象也成为太学生^{[4]746}。一旦有了这些身份,不仅可以获得商税减免,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综上所述,张四维身边的蒲州商人为其仕途成功提供了雄厚的财力保障,使并不经商仅拿微薄官俸的张四维可以打通内外朝的各种关系,从而为仕途进取提供便利,甚至遇到危机时也能用金钱予以缓解;受益者张四维也乐于对施恩者加以反哺,几乎所有曾给予其帮助的商人都因之而获益,如纳资获取功名、受到同侪商人或乡民的广泛尊敬。美名与尊敬正是成功商人在金钱之外渴望获得的。士人张四维在与商人的互动中,实现了双赢。

三、从墓志铭看士人张四维对商人的态度

张四维从小生活在商人家族并从中获益良多,但他同样从小业儒并追求入仕。一儒一商,分属传统“四民说”的两端。而士商文化又一直存在着碰撞:受儒家影响的士人一向以经邦济国为己任,对商人追求“蝇头小利”的逐利行为缺乏足够认可;而成功商人又偶尔轻视穷困的士人,目之为“酸儒”、“腐儒”。这种追求目标与生活环境对张四维形成了何种影响呢?

毋庸置疑,出身于商人家族的张四维对商人亲友有着深厚感情。如前所述,张身边的商人无论对其求学或是仕进都提供了切实的经济支持;他对此非常感恩并在宦业成功之后予以反哺。对身边人在商业上的成功,张四维难掩心中自豪,以致于经常在相关商人的墓志铭中对其财富进行夸耀。在追思长辈王从诒时说“性好佳马,每汲汲求之,百金不惜,厩恒有名畜焉。尝北视诸昆季,过燕赵郡国,市人无不聚观之者”^{[4]741}。在弟弟张

四教墓志中称其“乐施好义,当其意气所激,即挥置千金不顾”^{[4]744}。在叔父墓志中,张四维对张遐龄捐数百金修缮佛寺从而获得乡人称赞之事大书特书。张不厌其详地描述这些细节,透露出他对身边成功商人的激赏之意。

但张四维作为儒生,尤其是在登上宦业顶峰之后,因从小所受教育和入仕后所处环境的影响,又对士的身份、品行格外看重。这在他的笔下表现得极为明显。他为友人高鹏之父作墓志铭时着重介绍其“有功之从族闾殖生产者,则曰吾道不在是,海喟然自叹不获卒业于学”^{[4]713}的一面。为学友王希烈(公元?—1577年)之父书写墓志铭时说“介轩公性方洁,不苟殖货利”^{[4]694},认为不乐于从商反映出其生性高洁。但若以此言观之,其身边的商人亲故岂非生性不高洁之人?他对商人的矛盾心理可见一斑。

张四维的崇儒情结还表现在他书写商人墓志铭时,往往对商人的儒者气息着重书写。为舅父沈廷珍做墓志铭时说:“(廷珍)所至必携《小学》、《通鉴》,时颂习之,遇事辄有援证。工楷书,喜为近体诗,盈于囊篋,其嗜好然也。”言及舅舅沈江时说:“(江)弱冠失怙,不得终志于学,而好涉阅舟车所至,必携短帙自随,为能多通于方技小说家之言,其算数有声于廛井间,然人所亟称者则《周易》,课占言祸福,无不立应。”书写同乡任汝专之父任光溥事迹时云“以家累不获卒业,然志在是也,故虽挟资远游,所至必以篇简自随,遇先贤嘉言善行,则手录之。”^{[4]719}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张四维对“富而重教”的商人同样给予格外的关注。在“四民”观念下,读书入仕始终是不少家庭的重要选择,而经营成功的商人尤其注意培养子女。张四维和其友人韩楫、徐经便是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典型代表,且绝非孤例。张四维曾记其同乡商人贾氏培养子孙的成功“贾(氏)故以力田致饶,资雄数邑。诸子习公(张治化)教,皆循循儒者,以义称于乡,今其家奕奕起为儒门矣。”^{[4]736}对于学有所成的子孙,商人长辈也格外喜爱。张四维写道:“(徐杲)性喜儒术,常礼重儒者,余亡友中轩生(徐)经者,公之诸孙也。中轩生业儒而有至行,公爱之甚于孙。”^{[4]742}不难体现出成功商人对子孙仕路通达的期待。他对这些细节不厌其详的书写,无疑也表现出对“富而重教”行为的认同。

此外,张四维还注重对由士转商之人的赞颂,并对其弃儒从商的原因予以详解。他称赞任光溥说“公幼盖尝攻举子业,有成绪矣,乃不获究其志,弃而服贾,士友惜焉。”^{[4]719}格外突出其“士友惜焉”,也透漏出其感情倾向。又如沈廷珍之父沈明乃河东薛瑄的及门弟子,沈廷珍因之有较好的家学传统,但因沈明早卒,廷珍为维持家庭生意转而从商^{[4]734}。张对此记载颇详,甚至认为儒家修养有助于他们在转而商之后获得成功。在韩玻墓志中言其“雅嗜洁净,而尤好观古今史籍,故虽牵车服贾,能以心计阜通货贿,而擅其赢”^{[4]737}。这显然强调了韩玻之学养对其经商的帮助。

以上种种表明,张四维作为儒生和官僚,心理上对儒者的崇尚较之对商人的激赏略胜一筹。尤其玩味的是,张虽是阁臣中为商人所作墓志铭最多者,但其笔下的每一篇商人墓志铭中都明确地表露出其作文缘由,从中不难发现其商人圈其实极其封闭:其商人墓志铭无一例外为身边亲故所写,从未给其他商人写过,至少其文集没有。此外,从张四维所写的商人墓志中很难看出他对商人的深厚感情,尽管其中大多都是其亲人,但这些墓志用词单调、重复度高,其感染力甚至比不上为同僚张居正之父所写的墓志铭。

生长环境与追求目标的背离,使张四维形成一种“敬商远商”的矛盾感情。尽管在其所作墓志铭中也会偶尔表露出商人在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后单方面的自得,但更可以看出在当时“四民”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的情况之下,士不乐商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观。

四、明代士商关系再探讨

张四维的个案提供了一个有关“士商融合”的精彩样本。张作为商人之子,受到商人“富而重教”观念的影响,努力向学并最终取得宦业的成功;成功之后他也不忘回馈给予自己帮助的商人。然而,所学知识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也造成了张四维“敬商远商”的矛盾性格。通过张四维这一个案,我们已经不难对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

其一,“富而重教”后得以成功的士人对在背后给其提供经济支持的商人自当感恩图报,这显然是受到传统儒家“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9]观念的影响。但士人对交情不深的商人并未显出足

够的热情,从而形成了一种类似张四维般“敬商远商”的矛盾情形。这种矛盾感情并非孤例,另一出身商人家族而仕至高官的温纯(公元1539—1607)在奏疏中写道“臣宁以罪而行,不欲晓晓自白,以效商贾、妇人之口。”^[10]将商贾、妇人等同,无疑表现出古代官僚对商人的轻视。

其二,“士与商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分不清”的情况固然存在,但这种“士商融合”并非士商之间完全平等的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商人在努力营造一种近似儒者的高雅气息:如请士人代写墓志、积极寻求与士人交游应酬;士人却很少主动降低姿态去迎合商人的品味。显然不能因为商人对士人单方面的“攀附”,就认为士人对商人的看法有根本性改观。

其三,曾有学者“检查十五、六世纪的数以百计的商人传记,‘弃儒入贾’的个案几乎占十之八九”进而认为“形成了一个长期的弃儒入贾的社会运动”。^{[2]50}这固然反映了当时经济和文教都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情形,然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以及文教并不兴盛的地区,士商交流绝不如江南地区那般充分。通过张四维的案例不难看出:即便在山西这样一个有着良好经商土壤且富商辈出的地区,“弃儒入贾”也绝非已往学者所认为的是士人的首选,反倒有不少士人在家境贫寒且周围人皆劝其服贾的情况下仍在坚持读书以求仕进,直到家业窘迫导致生活难以为继时才“弃儒入贾”。在这些苦学以期入仕的士子眼中,并未觉得入贾能给他们带来比业儒更好的生活前景。明代山西地区的成功商人更是希望子孙能在仕途上取得成功,而非在商业上对父祖产业守成或开拓。这不仅未明显突出士人的“弃儒入贾”,反倒显示出商人对子孙“弃贾入儒”的期待。因此,仅因某些地区士商交流日益频繁就认为明代“士商互动使儒家的社会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向”并不严谨。

近人在论及士商关系时,往往把士人为商人所作墓志铭作为支持士商交谊的重要证据。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虽然不少士人为商人撰写墓志铭是因私交密切,但也有很多士人并非因二者有何感情,而是商人慕名以“润笔”换之^[11]。如当时为商人写墓志铭较多的官员李维祯,“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文多率意应酬,品格不能高也”^{[3]7386},显然被门生贪财所误。墓志数量紧随其后的王世贞时为文坛领

袖,为文也多应商人所求,故而对收取“润笔”表现非常坦然^[12]。从张四维的商人墓志铭可以发现,“润笔”现象在他身上难寻踪迹,其文集中并未留下任何为无关商人所写的应酬文字。同时,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敬商远商”矛盾感情并非孤例:出身于商人家族之高官温纯,虽然所写商人墓志铭也有 10 余篇,但绝少为不相关商人所写。如果将视野从山、陕地区扩展开来,不难发现朝中官员虽也多有为商人书写墓志铭的,但具体到个人,其数量往往只有两三篇^{[5]73-86};而且越是实职高级官员数量越少。这样有限的应酬文字,显然无法充分证明士商之间的具体交流情况及其交谊程度。

通过张四维的个案,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四民”观念下,士商之间的文化差异导致其交流并不充分,至少在 16 世纪后期广大的内陆地区仍是如此;在仕途上希望进取的官员,更会对与商人的交往持审慎态度。总的来看,所谓士商融合,其实并没有使士人对商人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更大程度上是商人单方面对士人的主动接近。这也说明,即使在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传统的“四民”观念仍然在不少地区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庄兴亮. 地方史视角下的福建翁山洪氏的宗族变迁: 1488—1752 [M]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清史论丛.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2: 85 - 100.
- [2] 余英时. 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业精神 [M] // 余英时. 中国文化史通释.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0.
- [3] [清]张廷玉. 明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4] [明]张四维. 条麓堂集 [M] // 续修四库全书: 集部别集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5] 吴文昭. 明代商人墓碑文对商人的书写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 [6] 小野和子. 明季党社考 [M]. 李庆, 张荣湄,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51 - 55.
- [7] 明穆宗实录 [M].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5: 2403.
- [8] 明神宗实录 [M].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5: 1523.
- [9] [汉]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624.
- [10] [明]温纯. 温恭毅集 [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288 册: 553.
- [11] 彭勇. 明代士夫追求润笔现象试析 [J]. 史林, 2003, (2): 52 - 56.
- [12] 张海燕. 王世贞墓志铭研究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Connection Between Officials and Businessmen in Semi-late Ming Dynasty

—Taking the Chief Cabinet Minister Zhang Siwei as an Example

YU Jin-d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Culture ,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Hong Kong 999077 , China)

Abstrac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businessmen and officials in Ming Dynasty has been a hot research topic. Researchers hold the view that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semi-late Ming Dynasty facilitated extens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businessmen and officials.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 chief cabinet minister Zhang Siwei shows that officials accepting Confucianism education who were brought up in businessmen families and supported by the businessmen class kept a respectful distance from businessmen. In this case, the essence of this so-called “close communication” between businessmen and officials indicates that businessmen became more and more Confucian other than officials catered to businessmen.

Key words: Ming Dynasty; connection between businessmen and officials; Zhang Siwei